

第一章

简要历史回顾

中国和非洲的历史交往始于几百年以前。而实际上，中非之间友谊纽带的自然生命力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就扎下了根基。

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早在公元 2 世纪的一个时期，中国和非洲已有了某种形式的间接联系。埃及出土的 3000 年以前的木乃伊中发现了中国丝绸的遗迹，就是证据之一。人们也知道，埃及末代皇后克里奥帕特拉常常身着中国丝绸衣服。众所周知，这些往来通过经由印度、波斯（伊朗）和叙利亚的贸易之路得到了加强。这些交往虽然不多 相距遥远 但却是和平友好的 并且在随后的世纪里直接交往奠定了基础。

的确 公元 2 世纪至 11 世纪，中国和非洲相互往来同以前的时期相比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往来仍旧友好，但基本上是官方性质的。众所周知，作为当时罗马帝国的保护

地，埃及曾派遣代表携带象牙、乌龟等非洲礼物呈献给中国皇帝。实际上，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和现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等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伴随着海上新贸易通道的发现，中非往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在唐朝和宋朝时期，中国皇帝派遣代表、学者和历史学家携带礼品赠送给北非和东非国家的皇帝。在这一时期，中国和非洲互利往来十分频繁。

公元 11 世纪至 16 世纪 双方往来的特点是彼此均希望更多地了解和理解对方。例如，一位名叫汪大渊的中国旅行家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337 年至 1339 年和 1347 年至 1348 年，他曾到过北非和东非的部分地区。同样 约在 1358 年，一位摩洛哥学者前往中国访问并记录了在中国所领略的景观、人民和传统习惯。据悉，在这一时期，双方也进行了官方互访。一方面中国明朝海上探险家郑和曾几次被派往东非一些地区，旨在建立更密切的官方和贸易关系。另一方面，诸如肯尼亚的马林迪国王等也相应地派遣了代表去中国访问。马林迪国王由王后陪同，不幸在去中国的途中逝世，并葬于中国的福建。在这些相互访问中，中国和非洲举行大型招待会、宴会、交换礼物和物资已成惯例。

17 世纪至 19 世纪发生了某些动乱，损害了中非关系的稳步发展，但中非关系从未中断过。同样，即使如中国革命、非洲独立斗争和冷战这样的

国内、国际事件接踵而来，中国和非洲国家所奉行的政策仍致力于满足彼此合作的迫切愿望。双方通过各种媒体的直接交往继续支配和影响着实态的发展。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联系纽带也体现在国际论坛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原则，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同时中非交往还体现在外交上相互承认，随后在彼此首都派遣使节并制定互利经济援助、国际贸易和文化教育交流政策。

因此，在 20 世纪里，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极其健康的发展，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几乎所有非洲独立国家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有外交关系或某种形式的联系。不仅如此，双方正采取重要步骤加强现已存在的关系。放眼四顾，双边和多边活动极其活跃：官方重要人物互访，举行论坛和贸易博览会，签订贸易、科学、文化、技术合作协定，发展项目落成或竣工；同时文化教育交流已成为平常的现象。所有这些活动对促进更好的相互理解有着重要意义，并且为中国和非洲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开辟了前进的道路。^①

此时，重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阁下 1996 年 5 月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六国的国事访问是极为恰当的。访问期间，江主席发表了当今有名的题为“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②的讲话。除去所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江主席还会见了非洲统一组织

秘书长艾哈迈德·萨利姆阁下 并且签署了 23 项贸易、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定、协议、意向书和谅解备忘录。实际上，这次访问的特点是加强了中非在下一个千年合作的基础^③。这些国家乃至那些不可避免地错过访问的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均对江主席的访问表示感谢，并宣称他们将在所有相互感兴趣的问题上同中国磋商和合作。因此，毫不奇怪，1996 年中国本着这种合作精神加入了非洲国家选举加纳的科菲·安南先生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活动^④。安南秘书长通过出席所有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特别关注非洲冲突的解决、发展项目、民主和债务补偿 给非洲以慷慨回报。

关于尼日利亚同中国的关系，据现有的文献记载 可追溯至 1957 年驻开罗的中国使馆商务官员陈海康（音译）先生同尼日利亚、加纳、埃塞俄比亚和坦噶尼喀（现在的坦桑尼亚）的官员一起建立了非官方贸易关系^⑤。另一方面，50 年代尼日利亚最有名的女社会政治活动家之一，已故的 F·兰索迈·库蒂夫人私下访问了柏林和北京，并分别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和“妇女国际民主联合会”会议。殖民当局对此颇为恼恨，因为当时的政府秘书长曾事先告诫她：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苏联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其将活动的意图加以伪装，旨在吸引有着人道主义理想的好心人。于是，当库蒂夫人坚持往访这些国家，申请更新护照

时，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拒绝。这一做法在尼日利亚和欧洲新闻媒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并且遭到了 1958 年尼日利亚众议院的严厉谴责。因此，已故总理艾尔哈吉·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不得不就拒绝库蒂夫人申请事宜的有关情况进行解释，并表示政府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渗入尼日利亚^⑥。当时，尼日利亚同东方集团国家和中国的一切交往均被加以制止和取消。事实上，全部从“未透露来源”获得慈善奖学金的尼日利亚学生以及赴东方国家出席国际会议的工会领导人均通过加纳的渠道，偷偷地离开尼日利亚。尽管形势不利，倾向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即激进的知识分子、工会领导人、记者等仍继续批评政府不允许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据记载，访问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知名人士有“北方进步分子党”领导人已故的马拉姆·阿米诺·卡诺；“强力党”领导人奇凯·奥比教授（博士）以及工会领导人，其中著名的是坦科·亚卡塞和萨卡·巴晓伦。他们承认自己倾向社会主义^⑦。

然而，1958 年 8 月 20 日尼日利亚总理在众议院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扭转了政府当时坚持的令人生厌的立场，讲话特别申明：

当然，我们力图同所有承认和尊重我国主权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而且我们不会盲目地

跟随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下，我们的政策选择均应依据尼日利亚国家利益这一独立的客观标准。我们认为，联邦政府把自己同大国集团的任何一方联系在一起以划线是错误的。行动的自由将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并且它将确保充分关注议会代表们发表的意见^⑧。

这段讲话对尼日利亚外交政策的定位仍十分恰当，所以在这里特意予以援引。

进而，1960年11月24日和25日（1960年10月1日独立后），尼日利亚总理在众议院另外一次外交政策辩论中发表讲话，自此“共产主义怪物”和“惧怕‘苏联控制’”的说法才终于得以平息。讲话明确宣布：

我们不认为包围整个红色中国、阻止它加入联合国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把6.5亿人民（现在13亿）拒之联合国大会之外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明智的。尼日利亚希望看到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⑨。

在联合国及其附属专业机构中，尼日利亚坚定支持中国，不仅口头上这样说，而且见之于实际行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随后的一次议会的外交

政策辩论中，已故前外交事务和英联邦关系部长扎扎·瓦朱古博士发言说，当联合国大会提出接纳红色中国的问题是否被列入辩论议程时，他对这一动议明确投了赞成票。当某些西方大国质问他的做法时，他如是进行了回答：

看，如果你们不允许我们根据我们的外交政策，以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投票，那将等同于思想帝国主义，那我们到这里（联合国）来用处何在呢^⑩？

遗憾的是，1967年至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由于“比夫拉”问题，尼联邦政府对中国的坚定支持多少受到削弱。由于西方大国和苏联给予联邦政府以财政和物质支持，内战危机的力量平衡倒向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一边。

即使红色中国被怀疑通过东非代理国家向“比夫拉”运送武器，但中国始终未承认“比夫拉”主要原因是它在分裂的双方均有朋友，并且也不愿被看作是支持肢解尼日利亚^⑪。

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同样本着这种精神继续同红色中国保持接触，并支持其恢复由所谓“中华民国”（或台湾）在联合国组织系统中非法占据的中国席位。毫无疑问，这一立场是基于联合国组织会员国普遍性原则，基于拒绝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会员

资格仍不正确这一事实。事实上，从 60 年代早期至 70 年代 尼日利亚一直在采取这一立场 并且认为背离普遍性原则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②。

因此 中尼友好于 1971 年 2 月 10 日结出了硕果，双方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71 年 4 月 6 日，中国及时在拉各斯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几个月后，1971 年 10 月尼日利亚在北京设馆。这样两国之间长达 28 年之久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受益的关系真正拉开了序幕。

注 释

① 1996 年 7 月 22 日，戚本杜先生在尼中友协年会大会上所作的中非关系演讲。

《中国 1997 年事实和数字》。

③ 1998 年 9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日利亚前大使吕凤鼎先生发表的“关于中尼关系的讲话”。

拉各斯伊科依岛“联合国新闻中心”。

阿拉巴·奥贡桑沃教授编写的《中国在非洲的政策（1958～1971）》第二章“开辟新天地（1958～1959）”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⑥ 《尼日利亚讲演集》已故总理艾尔哈吉·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讲演集，1958 年 3 月 3 日关于“库蒂护照”的讲话。

⑦ 阿拉巴·奥贡桑沃教授编写的《中国在非洲的政策（1958～1971）》第五章“乌云笼罩：文化大革命”，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⑧ 《外交政策声明选集（1960～1964）》，由尼日利亚外交部出版。

⑨ 同上。

⑩ 同上。

⑪ 同注⑦。

⑫ 《尼日利亚在联合国为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合作：联合国系统》由第三世界出版社 奥科帕库通讯有限公司分公司 出版。

第二章

政治合作

尼日利亚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两国在独立之前均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过斗争。尼日利亚的主要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无神论者；中国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非洲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尼日利亚人；亚洲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世界上每五个黑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世界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尼日利亚人口 1.1 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 13 亿，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尼日利亚有着丰富的各种矿物资源；而世界上所有已经知道的矿物资源中国均有丰富的蕴藏。

尼日利亚的民主进程尽管遭受到军人的介入和破坏，但尼日利亚仍不失为整个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事实上的领导者；而中国长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公认的全球性政治大国。因此，一句话，尼日利

亚和中国有着许多显著的特点表明，两国分别作为非洲和世界人口大国需要建立紧密的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不能因国际谦让而忽视或不考虑尼中两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所以，尼中两国在相互促进合作和分享经验中获益多多，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

现在来谈一下在过去的岁月中尼中两国在政治层面上是如何进行合作的。首先要回忆的是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普遍接受的国际外交准则以及支配国家间关系法规的基础上，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如下：

- (1)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2) 互不侵犯；
- (3) 互不干涉内政；
- (4) 平等互利；
- (5) 和平共处。

人们欣喜地注意到，在宣布尼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简短仪式上 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声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而中国代表则代表中国政府保证“坚定支持整个非洲国家，特别是要支持尼日利亚”^②。在过去的岁月里，两国遵守了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原则。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尼日利亚和中国把它们之

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促进的。所以，两国在其所有参加的国际论坛即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讨论中均相互支持。

同样，两国均是南南合作的伟大倡导者。他们把南南合作看成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手段，而迄今新秩序尚未建成或远离国际社会。

中国尊重和钦佩尼日利亚奉行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尼日利亚是“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虽然 1993 年由厄尼斯特·舒尼肯酋长（博士）为首的尼日利亚临时政府曾允许台湾在拉各斯设立贸易办事处，在卡拉巴尔市建立分支机构（名称为“台北贸易代表处”）尽管台湾驻尼所谓“代表”一再要求，但临时政府未给予其外交地位。所以，他们没有资格享有外交特权^③。〔参阅附录一和附录一（A）尼日利亚外交部分别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所有驻尼使团的照会。〕

尼日利亚完全支持按照中国同英国达成的法定协议，香港 1997 年 7 月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尼日利亚已将其在香港设立的“公署”或“办事处”根据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改成了总领事馆。应该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从建立“公署”或“办事处”起，就把香港看作是商埠，而不是远东的外交使团和窗口。事实上，北京的一些外交使团

依然将香港当成中转站交换信使袋，并利用这个机会采购中国内陆没有的或价格高昂的必需品。去香港是一趟‘荣誉’差使，总是被看作是对在北京辛勤工作的外交官包括大使或首席官员的一种待遇。

此外，尼日利亚依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于 1987 年 4 月 13 日签署的联合声明。根据声明，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将对被葡萄牙统治 400 年的澳门恢复行使主权^④。事实上，何厚铨先生已被选为澳门回归后的首席执行官。同香港一样，澳门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并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因此，尼日利亚赞赏澳门按照过渡计划，在无怨恨的情况下平稳顺利过渡。

尼日利亚和中国也信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支持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体现出更平等的代表性^⑤。

其他促进两国互利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两国在公营和私营部门各个层面上的大量互访。

在尼方面，1960 年尼日利亚总理一打开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大门，由当时的联邦财政部长、已故费斯图斯·奥科泰·埃博酋长率领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高级经济代表团便于 1961 年访问了苏联和中国^⑥。这一事件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次访问一般认为是联邦政府特意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目的是减轻尼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增加同

东方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额。

1973 年 当时的联邦外交部长、已故的奥科伊·阿里克波博士对中国进行了又一次重要访问。1974 年 9 月，前国家元首雅各布·戈翁上将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目的主要是表明联邦政府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访问结束时双方签署的公报特别确认了两国的友好关系^⑦。

双方的访问还有，1979 年 4 月尼日利亚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已故的谢胡·穆萨·亚拉杜瓦准将应中国领导人耿飚先生的邀请访问了北京，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包括由中国专家改造尼铁路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双方签署了一项农业、贸易和工业的双边合作协议^⑧。

几年以后，在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前副总统阿莱克斯·埃奎梅博士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先生以及总理先生进行了会谈^⑨。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表明，尽管有些惧怕社会主义倾向和共产主义，但尼日利亚政府已做好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道工作。

1985 年 5 月，前国家元首当时的军队总参谋长易卜拉欣·巴班吉达少将率领军事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⑩

因此，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自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尼日利亚的每一届政府均认为须派遣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交换看法，强调同中国保持真诚

关系的愿望。

结果，一些联邦部长、议员（参议院和众议院）、军界人士（陆海空军）、联邦政府国营公司、青年组织、有组织的私人部门、商会、国际事务学院（仅列举少数于此）沿着已开辟的渠道，分别应相应部门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目的是在各自权限之内，在相互感兴趣的问题上促进友好关系。

1996年10月，曾在1993年任尼日利亚临时政府首脑欧内斯特·肖内坎酋长（博士）在被任命为2010年远景规划主席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目的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2010年发展纲要。其他为促进其权限内问题的解决而访华的重要人物有：前联邦运输部长已故I·古麦尔少将，讨论关于修复尼铁路系统问题；前外交部长汤姆·伊基米酋长，出席尼中混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前联邦青年和体育部长吉姆·思沃博多酋长，讨论有关青年和体育问题；联邦动力钢铁部长I·海戈尔教授，讨论有关电力、钢铁合作问题；前联邦新闻文化部长瓦尔特·奥费那戈罗博士，商谈落实文化交流计划^①，等等。所有这些访问以及两国代表团团长随后签署的决定、协议、谅解备忘录等均产生巨大影响。

1997年，尼前国家元首阿博杜尔萨拉米·阿巴巴卡尔上将（已退役）以陆军参谋长身份率领又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相应领导人就